

上海研究生教育丛书

世界 人口 地理

本教材得到
上海市研究生
教育专项经费
资助

张善余◎编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世界人口地理总论	(1)
第一节 当代世界人口变动的新形势	(1)
第二节 粮食、耕地和人口承载力	(44)
第三节 城市化和逆城市化	(63)
第四节 国际人口迁移	(100)
第二章 亚洲	(126)
第一节 概述	(126)
第二节 日本	(132)
第三节 印度	(159)
第四节 西亚	(178)
第三章 欧洲	(189)
第一节 概述	(189)
第二节 英国	(196)
第三节 法国	(212)
第四节 俄罗斯	(227)
第四章 非洲	(248)
第一节 概述	(248)
第二节 非洲人口再生产形势分析	(256)

前 言

本书是在1999年出版的《人口地理学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基础上编写的,目的在于对世界人口地理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若干重要国家的人口地理作进一步的研讨。

本书参阅了大量文献,其中主要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分部、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粮农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各相关国家的国家统计局和人口研究机构出版的各类年鉴和资料(部分通过互联网)。为节省篇幅,凡出自这些途径者,一般均不再一一注明出处。其他的主要资料来源,已列于书末,在正文中一般也不再注出。上述来源中涉及中国的数据,与中国本国的统计,可能小有出入;不同来源的数据之间,也可能互有参差,但这些均无实质性的影响。

张善余

2002年5月16日

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人口研究所

第一章 世界人口地理总论

第一节 当代世界人口变动的新形势

一、战后世界人口的高速增长

在 20 世纪,人类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和进步。应该指出,这一巨大发展和进步,主要发生在 20 世纪的后半期;而其前半期,由于先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人类文明迭遭重创,社会发展经历了巨大曲折。对比之下,20 世纪的后半期,世界在总体上一一直处于和平状态,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再加上科技革命新浪潮的推动,致使全球各地都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世界生产力水平不断向前跃进,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速度是以往任何时代都难以比拟的。

在此背景下,世界人口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其增势无比迅猛,以致人们惊呼“人口爆炸”,并普遍认为这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1950 年世界总人口为 25.20 亿,至 2000 年已激增至 60.57 亿,半个世纪年均增长 7 074 万人,年递增率高达 1.77%;而 20 世纪前半期仅分别为 1 742 万人和 0.85%。战后世界人口增速最快的时期是 20 世纪 60 年代,其中 1963 年 2.20% 的增长率是整个人类历史

上的最高记录。

严格地说,“人口爆炸”并非是全球性的,它基本上只发生于发展中地区;而发达地区^①虽然在 60 年代中期以前出现了一段“婴儿热”(baby boom),但其持续时间不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补偿性和结构性的。

所谓补偿性生育高峰,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 年)使一部分发达国家蒙受巨大的人口损失,并使许多人婚姻推迟,生育减少,战后出现“婴儿热”是一种自然的补偿。此外,战争造成的种种苦难,以及战后出现的大规模国际人口迁移,也刺激了人们的婚姻和生育意愿。

所谓结构性生育高峰,是指发达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年)后的补偿性生育高峰,经过一个世代的间隔后,在时间上恰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补偿性生育高峰相互重叠,对“婴儿热”进一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很显然,无论是补偿性的还是结构性的生育高峰,其作用时间都不可能很长,一般只能持续十余年,因而到 60 年代中期,“婴儿热”便迅速退潮。而即使在其高峰期的 50 年代,发达地区的年均自然增长率亦仅达到 11.6‰,只比战前的 30 年代高 3.6 个百分点。从 60 年代中期起,自然增长率即跌至战前水平以下,到 90 年代末,发达地区在整体上更进入了零增长阶段。整个 20 世纪后半期,发达地区年均自然增长率为 6.4‰,明显低于前半期的 8.1‰。毫无疑问,战后的所谓“人口爆炸”基本上与发达地区无关。归根结蒂,其原因就在于多数发达国家在战前就已基本进入了人口转变的后期。

发展中地区与发达地区的人口态势则截然不同。除中国等少数东亚国家外,发展中地区受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较少,因此基本上不存在上述发达地区那样的补偿性和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其“人

^① 本书中的发达地区指欧洲、北美洲各国和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其余即为发展中地区。书中涉及的各大地理区域,均采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划分,具体范围见书末附录一。

口爆炸”的发生,完全是在社会经济环境巨大变革的促进下,人口转变规律自发作用的结果,而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尤其是在医药卫生和营养保健方面)的分享,显然也是其“人口爆炸”的推动力之一。

作为一个整体,发达地区的人口转变早在 19 世纪就已经开始,其显著标志就是年均粗死亡率从 18 世纪后半期的 34‰和 19 世纪前半期的 32‰降至 19 世纪后半期的 29‰,到 20 世纪第一个 10 年,又剧降至 21‰。期内粗出生率变化不大,致使自然增长率由 4‰提高到 13‰,显示出早期扩张阶段的典型特征。此后,受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迅速向后期扩张阶段演化,自然增长率大幅减缓。

发展中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出现人口转变的势头,其早期扩张阶段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即 20 世纪 20~40 年代,出生率保持不变,死亡率下降,自然增长率由 3‰~4‰提高到 10‰~12‰。后期,即 50~60 年代,出生率在前期的高水平上小幅上扬,死亡率再度大幅下降,自然增长率跃升至 21‰~24‰,这是一段名副其实的“人口爆炸期”。进入 70~80 年代,出生率明显地自高点下落,尽管死亡率仍保持下降趋势,但人口增速开始减缓,显示出发展中地区在人口转变上已经向后期扩张阶段演化。直到 90 年代末,自然增长率仍大大高于战前水平。整个 20 世纪后半期,发展中地区年均自然增长率为 19.6‰,而前半期仅为 7.5‰。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由于处在不同的人口转变阶段,战后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展示出两种大相径庭的人口发展态势,“人口爆炸”基本上只发生在发展中地区,并由此导致世界人口分布格局的巨大变化。

在 20 世纪的前半期,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人口增长速度的差异并不明显,在各大洲之间,亚、欧两洲人口比重下降,其余各洲上升,但这主要是受战争和国际人口迁移的影响。战后以来,发达地区

和发展中地区在人口增长速度上出现了极大的差距,二者(包括所属各大地理区域)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此落彼涨,变化幅度很大,其中欧洲的下降和非洲的急升尤为引人注目(见表 1-1)。如果考虑到战后年均达 100 万人的国际人口迁移,基本上都是由发展中地区迁往发达地区,则二者的人口自然增长速度的差距将比表 1-1 所显示的更为巨大。

表 1-1 1900~2001 年间世界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

区 域	总 量(亿人)			比 重(%)			1950~2001 年 增幅(%)
	1900	1950	2001	1900	1950	2001	
世 界	16.50	25.20	61.37	100.0	100.0	100.0	143.6
发达地区	5.40	8.14	11.93	32.7	32.3	19.4	46.6
发展中地区	11.10	17.06	49.44	67.3	67.7	80.6	189.8
亚 洲	9.47	13.99	37.20	57.4	55.5	60.6	165.9
欧 洲	4.08	5.48	7.27	24.7	21.8	11.9	32.6
非 洲	1.33	2.21	8.18	8.1	8.8	13.3	270.3
北 美 洲	0.82	1.71	3.16	5.0	6.8	5.1	84.1
拉丁美洲	0.74	1.67	5.25	4.5	6.6	8.6	214.4
大 洋 洲	0.06	0.13	0.31	0.4	0.5	0.5	145.6

从世界各国各地区来看,由于自然变动和迁移变动的双重影响,人口增长速度的差距远较大洲间悬殊。1950~2000 年间,全世界人口增幅最大的国家和地区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36.5 倍)、卡塔尔(21.6 倍)、西撒哈拉(17.0 倍)、科威特(11.6 倍)、吉布提(9.2 倍)等;增幅最小的国家有匈牙利(6.8%)、保加利亚(9.6%)、捷克(15.1%)、英国(17.4%)、葡萄牙(19.2%)等,此外,还有几个小岛国,如纽埃、圣基茨和尼维斯、蒙特塞拉特等,人口绝对数减少。将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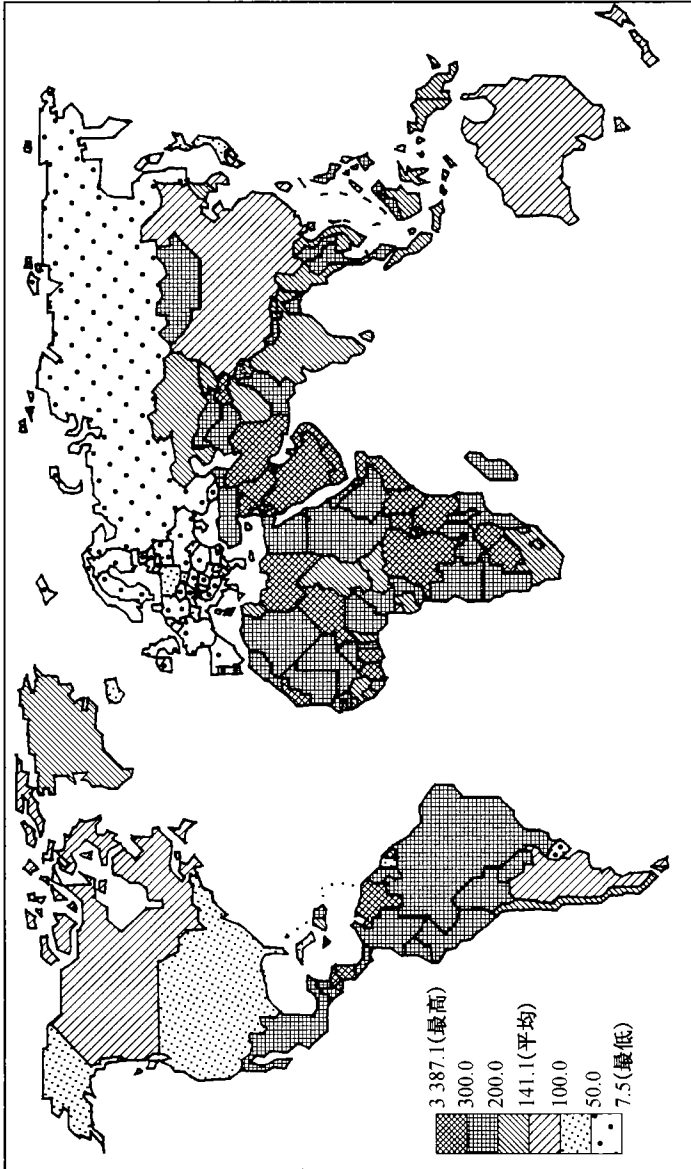


图 1-1 1950 ~ 2000 年间世界各国各地区人口增长率

拉伯联合酋长国与匈牙利相比,人口增长幅度相差 530 余倍,后者 48 年的增幅仅与前者 1 年的相当,差距极为悬殊。当然,如此巨大的差距中有一部分是国际人口迁移造成的,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人口增量中,人口净迁入占了六成;相反,匈牙利的人口自然增量却被人口净迁出抵消了 1/3 以上。即使单纯比较两国的自然增长率,相差亦达 14 倍,差距也非常悬殊。

从人口学角度分析战后世界“人口爆炸”的直接动因,可以发现其中起了最主要作用的是死亡率的下降和平均寿命的延长;相比之下,所谓生育高峰的影响则是很次要的。据分析,20 世纪后半期世界平均人口出生率比前半期下降 1/5,而死亡率则下降了将近 3/5,后者绰绰有余地抵消了前者,并由此引发“人口爆炸”。从表 1-2 可见,20 世纪后半期世界人口实际增长数,比按前半期的人口生命率推算数多出 22 亿,其中因死亡率下降(或者说相对于前半期少死亡)造成的人口增量占 82%,而多生育只占 18%;因少死亡而造成的增量,贯串整个后半期,因多生育而造成的增量基本都集中于 50~60 年代。表 1-2 还显示,在发达地区,20 世纪后半期死亡率的下降未能抵消出生率的下降,致使人口增量相对于前半期有所减少,也就是说人口增速更慢了。

发展中地区在战后普遍经历了“人口爆炸”,根据生命率变动特点,可将其区分为以下 3 种类型:

(1) 被动型

这一类型以中国为代表,还包括泰国等少数国家,它们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出生人口相对于前半期的生育水平有所减少,因而其“额外”人口增量全部是由死亡率下降造成的。

(2) 半主动型

这一类型以印度为代表,它们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出生人口相对于前半期略有增多,但由此造成的“额外”人口增量,明显少于因死亡率下降造成的增量。

(3) 主动型

这一类型包括大部分非洲和西亚国家,它们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额外”人口增量主要是出生率较前期上升造成的,而死亡率下降仅起了次要作用。

从人口结构因素看,上述被动型国家“人口爆炸”时间短,潜在的生育力相对较小,老龄化速度快,在今后一段不长的时间内可望完成人口转变。相反,主动型国家“人口爆炸”时间长,潜在的生育力巨大,它们完成人口转变的时间将会相当漫长。

二、“人口爆炸”扩大了南北发展差距

战后发展中国家经历了空前绝后的“人口爆炸”,无疑是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许多国家在短短几十年中人口增长了几倍,甚至几十倍。就其中的大部分国家来说,在人口高速增长的同时,平均生活水平仍有所提高,国家的经济总量则显著扩大。一些过去人烟稀少的国家,通过人口的快速增长,不仅大规模地开发了自然资源,还为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及早达到公用基础设施的“门槛人口规模”创造了条件。而与人口快速增长相伴随的更大规模的国内、国际人口迁移流动,在经济上和社会上也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仅就国际意义而言,战后世界人口的高速增长既有其必然性,与社会经济发展大体上也是相互适应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逐渐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往昔殖民地时期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其人口总量庞大,生产力和消费力又极具潜力,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但必须指出,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也不仅仅是单纯追求增大经济总量,归根结蒂,它是为了尽可能地提高现有人群的生活质量,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然而,战后发展中地区的“人口爆炸”,就大多数国家而言,其人口增长速度均超越了适度水平,新增的经济总量不得不大量消耗在养活更多的人口

上,于是产生出如世界银行专家所指出的后果:“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迅速增长,影响了它们去取得本来也许能取得的进步——使人民失去了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对世界上大量的穷人来说更是如此。”^①

应该看到,与发达国家早期进行工业革命、推进人口转变时相比,战后发展中国家在出现类似过程时,内、外部环境是有许多重大差别的,主要表现为:

首先,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不像当初发达国家是伴随工业化发展的自发而缓慢的过程。当初发达国家在进入早期人口扩张阶段时,死亡率虽趋于下降,但速度不快,因此自然增长率上升幅度也不大,远未达到“人口爆炸”的程度。战后发展中国家由于分享了先进的医疗科技成果(如抗菌素、杀虫剂等),死亡率呈断层式剧降,而社会经济仍然是整体性落后(例如小生产占绝对优势、文盲率高、社会机制不健全、人力和物质资本尚未很好形成等等),致使这些国家在生育控制方面难以取得相应的成就,“人口炸弹”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引爆的。简言之,发展中国家进入人口转变期的社会经济基础,远较当初发达国家薄弱。例如,20世纪6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均GNP,按可比的购买力平价,不到19世纪晚期美国的1/10,而人口增长速度却要高出1~3倍,这就显著增大了发展中国家实现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困难。

从图1-2可见,发展中国家虽然社会经济特点各不相同,但总的来看,生育水平与生产力发展有着较大的相关性,“人口爆炸”主要发生在—批经济最落后的国家中。

其次,欧洲国家实现人口转变时产生的人口压力,通过大量向海外移民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化解,有些国家曾在不长的时间内,将本土人口大批迁至国外,而战后发展中国家对外移民的规模则要小得多。还有,像美、俄、加、澳等国拥有可供人口拓展的巨大的地理空间,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不具备这样的资源基础。

^① 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译本,7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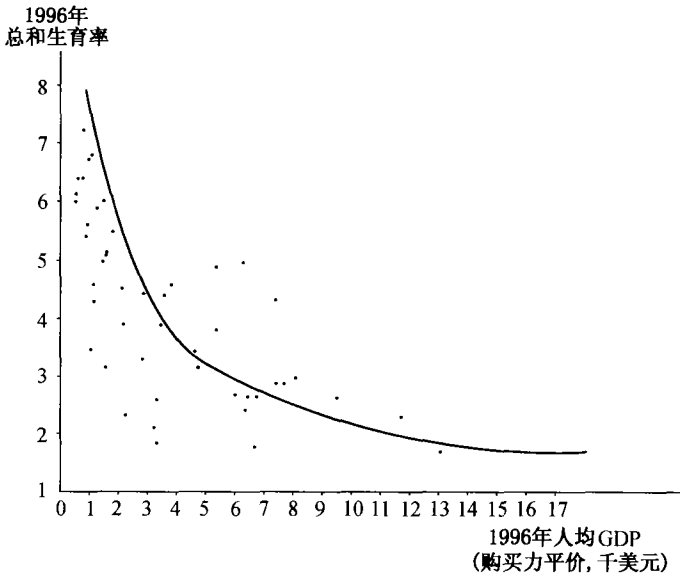


图 1-2 1996 年发展中国家总和生育率与人均 GDP 相关图

第三,领先一步的发达国家始终把握着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当它们已经完成工业化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才刚刚起步。当后者工业化取得一定进展时,发达国家又引导世界进入了新经济时代。在这样被动的状态下,再背起日趋沉重的人口包袱,使得发展中国家越发处于不利境地。

在上述背景下,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一直致力于社会经济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即一般所说的“南北差距”却愈拉愈大,且其速度还有加快的趋势。19 世纪初,世界上最富的和最穷的国家人均收入大约为 3 : 1;20 世纪初为 10 : 1;1950 年为 35 : 1;而到 20 世纪末已扩大至接近 70 : 1。仅就 20 世纪后半期而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一般并不比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慢,有不少甚至比发达国家还快得多,但“人口爆炸”却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些发展成就减色,在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上未能取得更大的进步。1965~1998 年间,发

展中地区 GNP 增长幅度比发达地区高 0.5 倍,但后者人均 GNP 的增幅却反而比前者高 0.7 倍,原因就在于前者的人口增幅比后者竟超出 3.5 倍之多。同期内,在世界六大洲中,基本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 GNP 增幅分别名列前三位,而基本属于发达地区的大洋洲、北美洲和欧洲则分居后三位。但人均 GNP 的增幅,欧洲反居第一位,拉丁美洲和非洲则居最末两位,充分说明人口增速的差异,确实拉大了南北经济差距。上述态势从 20 世纪初一直持续到现在,对世界人口、经济的总体格局产生极大影响,这一点在表 1-3 中可以看得很清楚^①。

表 1-3 20 世纪世界各大区域人口、经济发展态势的变动

地 区	人口占世界%			GNP 占世界%			人均 GNP (以世界为 100)		
	1900	1965	2000	1900	1965	2000	1900	1965	2000
世 界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发达地区	32.7	29.0	19.7	62.5	64.4	58.7	191.3	222.0	298.7
发展中国家	67.3	71.0	80.3	37.5	35.6	41.3	55.8	50.1	51.3
亚 洲	57.4	57.0	60.5	32.6	28.9	37.5	56.8	50.8	62.1
欧 洲	24.7	19.0	12.0	42.4	30.3	25.5	171.7	158.8	213.0
非 洲	8.1	9.4	13.1	3.4	3.7	3.0	41.8	39.2	23.1
北美洲	5.0	6.6	5.5	16.6	27.4	24.6	334.2	416.5	473.3
拉丁美洲	4.5	7.5	8.6	4.0	8.4	8.1	89.7	111.5	95.4
大洋洲	0.4	0.5	0.5	1.0	1.3	1.4	272.5	248.4	274.8

资料来源: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XX Веке,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1 (1). 有增补。

过高的人口增长率对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主要

^① 参阅张善余:《20 世纪:世界人口与经济发展回眸》,《世界地理研究》,2001(4)。

表现在以下几点:

(1) 增大了消费,减少了积累,使得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更快的扩大再生产去缩小南北差距。

近几十年来,由于需要供养的人口越来越多,致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处在节衣缩食的低消费水准上,仍不能使总积累率显著超过发达国家,1996年发展中地区的平均积累率为24%,略高于发达地区的21%,除去中国,其余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积累率仅为17%,反而明显低于发达地区;有一些则更低,甚至为负数。如1996年孟加拉国和埃塞俄比亚平均积累率仅为7%,尼日尔、马达加斯加为4%,坦桑尼亚、中非、乍得、尼加拉瓜为3%……在这种状态下,要缩小南北差距显然是不可能的。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几十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速度既比人口增长速度慢,又比劳动力增长速度慢,从而导致人均GNP和劳均GNP的双重持续下跌。原有居民的生活水准不仅难以提高,还有每况愈下之势,贫困面不断扩大,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1987年发展中地区有12.17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日均收入1美元)以下,1993年增至12.89亿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其相对比重均有所上升。

(2) 短缺的供给能力难以满足过于庞大的教育需求,使发展中国家在智力开发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增大,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

“人口爆炸”的后果之一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化。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发展中国家0~14岁少年儿童比重达到历史最大值41.8%,比同期的发达国家高15个百分点,由此产生的庞大教育需求在低收入状况下根本无法满足。虽然不少发展中国家深知教育关系未来的国家命运,因而努力增大投入,使教育经费占消费总额的比重普遍大于发达国家,但人均教育经费(尤其是按学龄人口)的绝对数额仍远远低于后者。如1996年美国对教育的总投入占GDP的10.8%,孟加拉国占17.9%,但人均绝对值前者为3.035美元,后者

仅为 180 美元(均为购买力平价),若按学龄人口计,差距还将再扩大 1 倍。90 年代初,前者成人受教育年数一般为 12~17 年,后者为 2~11 年。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居民平均的文化科学素质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就不足为奇了。

(3) 源源不断成长起来的劳动力大军,对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市场造成持久的沉重压力,也给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带来不利的影晌。

由于受“人口爆炸”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的制约,再加上国民平均受教育年数短,缺乏完备的退休养老制度,许多发展中国家多年来劳动力的增长速度甚至比人口增长速度更快。如 1980~1996 年间,拉丁美洲的劳动力从 1.30 亿增至 2.01 亿,增幅达 54.6%,而总人口增幅为 35.8%,对比之下,同期内全洲 GNP 仅增长 46%。也就是说人均 GNP 上升了,劳均 GNP 却下降了,清楚表明这些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数量的增多,并未相应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反而使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降低了。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积累少,投资少,无论资本、技术,还是资源,均无法适应劳动力激增的需求,这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极为悬殊。据世界银行资料,1980 年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尼泊尔等国家每个新增劳动人口分摊的国内投资额,仅为西方发达国家的 1/100~1/500,泰国为日本的 1/50,巴西为美国的 1/5。1996 年美国国内投资额为 13 380 亿美元,新增劳动力约 190 万人,劳均分摊的投资额逾 70 万美元。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合计投资额为 156 亿美元,按新增 800 万劳动力分摊,仅为美国的 1/365。

发展中国家由于劳均投资少,生产力的技术构成低,严重阻碍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粗放型第一产业和低层次第二产业占绝对优势的格局难以改变,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在大量占用劳动力资源的同时,必须大量占用和耗费自然资源,后者成为社会财富增加的必要条件。在生产力发展的初期,这条路还走得通,但一旦自然资源因开发过度 and 利用不当,在数量和质量上进入“自然递减”状态,则生产力的进一